

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历史省思与理想建构

王建华, 贾 佳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是中国大学以中国文化为根基所形成的使中国大学之为中国大学的根本性特征。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大学在本质上并非只是横向移植西方大学模式的一类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于一体的社会机构,而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区别于任何其他国家大学机构的文化实体。立足文化的视角,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自晚清以来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合理性、历史局限性兼具。当前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出发,中国大学文化性格之再塑不但必要而且可能;未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理想构建在于回归大学之道,复兴中国悠久的人文传统,保障知识分子的主导地位,以促成“中国大学模式”的形成。

关键词: 中国大学;中国文化;文化性格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16)01-0006-06

十余年前,许美德(Ruth Hayhoe)曾将中国大学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提出“中国大学模式”这个命题。根据许美德的解释,所谓的“中国大学模式”不仅只是对西方大学进行批判与反思,更需要汲取中华文明的智慧并实现文明对话,重点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历史的偶然,中国大学自诞生以来就被过多地限定在普泛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或被解释为“旁采泰西”的结果,或被理解为一种“横向的移植”,诸如“盆景艺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凯旋”以及“不能当真的大学”等概念成为中国大学的标识。结果是,中国大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大学认知中的一个模糊点:一方面关于中国大学的文化民族性是否存在尚未达成共识更未得到普遍认可;另一方面由于急于对中国大学的文化民族性进行价值批判,严重缺乏历史性考据与内涵式理解。在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高等教育同质化、市场化愈演愈烈,现代社会迫切要求中国大学能够承继中国文化以自存。缺乏理论上的认同与深度理解,而又裹挟于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国大学之为中国大学

的特殊性大有“未立而亡”之趋向。基于此,文章提出“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这一命题,意在强调与论证中国大学在本质上并非只是横向移植西方大学模式的一类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于一体的社会机构,而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区别于任何其他国家大学机构的文化实体。

一、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内涵与历史省思

作为概念,中国大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开;作为存在,中国大学很难也不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划清界限。近代以降,中国大学“直取欧洲之制”而建立,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然而“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教育虽经历过仿日、学美、效法、学苏几个阶段的变迁,有的阶段几乎还是全盘仿行某国的教育模式,但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仍然在许多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特色”,正如刘海峰所言:“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和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中国古代大学已形成一些与西方大学有所不同的特点,直至现代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大学还有不少影响。”^[1]近代中国大学之建

收稿日期:2015-10-26

基金项目:江苏省第四期“333工程”科研资助立项项目(BRA2015336)

作者简介:王建华,教授、博导,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贾 佳,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主持人简介:庞海芍,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书记,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秘书长,从事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教师发展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27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2.1774.g4.20151127.1129.034.html>

立,表面上是西方大学模式移入中国高等教育以现代取代传统;然则植根于中国千年文化传统,中国大学所谓的“横向移植性”也并非一种无序的行为,其内在秩序的主导者仍是中国传统文化。涂又光解读蔡元培“大学”观的思想来源,一语道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根本性关系。“西方影响再大,也不能取代蔡氏之学的主根。不仅不能取代,而且西方影响只能通过蔡氏之学的主根才能起作用。”^{[2]307}从这个角度讲,近代中国大学的成功移植,关键在于发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根与中介作用。以此为视点,“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这一命题本质上在于挖掘传统文化对于中国大学的独特解释力。谓之“性格”,主要是对中国大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本质关系的一种形象描述。“性格”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主要用以形容人的性情品格,目前在学界已经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到不同的学科领域,应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文化性格”是“性格”在文化领域的拓展,与文化民族性联系密切。石中英较早在教育领域定义并使用了“文化性格”。在《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一书中,石中英将“性格”、“文化”与“教育学”三词合一提出了“教育学的文化性格”这一概念,具有开创意义。立足中国文化语境,在汉语中,“性格”是人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是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性格”是在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并给个体的一切活动着上了底色。在英语中,“性格”就是“character”,指人所持有的“品质”,但这个词在英语中也表示事物的“特性”“特征”。我们是在汉语语境下来使用“性格”这个词的。从“性格”的定义来看,尽管它有属物的、自在的、静态的、同一的、自然的一面或基础,但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它是属人的而非属物的,生成的而非自然的,具有极大的动力作用。这样,通过把“性格”概念的上述特征赋予教育学活动,并与“文化”概念结合起来,就生动地表达了我们对教育学根本问题的认识,对逻辑的、技术的外表下教育学活动实质的把握,对以上各种活动要素文化特征的总概括^[3]。文章将“性格”、“文化”与“中国大学”合而为一构成“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这一概念,意在强调中国大学本质上并非只是横向移植西方大学模式的一类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

能于一体的社会机构,而是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区别于任何其他国家大学机构的文化实体。其概念上可以界定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所形成的使“中国大学之为中国大学”的根本特征。

从近代第一所中国大学诞生算起,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掀起了继明末清初以来又一次西学东渐的浪潮,进入了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以辛亥革命为分界,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变革与西方文化的双重挤压下,裹挟于批判与反批判的文化论争,总体进入了一个落寞期。但如余英时所言:“20 世纪初叶中国‘传统’的解体首先发生在‘硬体’方面,最明显的如两千年皇帝制度的废除。……但价值系统是在‘传统’的‘软体’部分,虽然‘视而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但确实存在的,而且直接规范着人的思想和行为。1911 年以后,‘传统’的‘硬体’是崩溃了,但作为价值体系的‘软体’则进入了一种‘死而不亡’的状态。”^[4]19 世纪末,第一所中国大学诞生,植根于“死而不亡”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开始形成与发展。在传统社会最后一批“士”,即晚清士大夫的影响下,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表现出了浓厚的儒家文化特征。首先,在教育宗旨上,大学提倡“忠君尊孔”。1906 年,学部《奏陈教育宗旨折》将“忠君”“尊孔”确立为中国教育的宗旨,传统教育的伦理性与政治性作为官方意志被重新引入新的教育体制。其次,在教学目的上,大学以“学仕一体”为根本。如 1898 年京师大学堂创建之初孙家鼐即呈《奏筹备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一方面要求“凡学堂肄业学业优异者,请旨录用为官”;另一方面提议“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拟立仕学院”,所秉承的即是儒家“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教育思想。最后,在教学内容上,大学格外强调经学的主体地位。以张之洞等所起草《奏定大学堂章程》为例,大学堂设八科之学,特设经学大学列首位,其后依次是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学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经学科大学之下详设周易学门、尚书学门、毛诗学门等 11 门,专修中国古典经学,以外国文史辅助。

晚清之后,民国三十余年中国文化进入了西化氛围极为浓厚的时代,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

全盘反传统主义达到顶峰。20世纪80年代末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为“五四运动”贴上了“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标签。然则,“五四”时期所谓的“全盘反传统”的口号固然响亮,却既未实现亦未持久,很大程度上只是争得了一时的话语胜利。诚如刘梦溪所言:“当时搏击于时代浪潮巅峰的优秀分子,一个个都是旧学根底深厚的学问家,他们何曾要否定一切传统文化?”^[5]“所谓‘五四’的精神,反传统主义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另一个方面,却正是一种浓厚的传统精神。”^[6]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大学及其文化性格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此一时期,在民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大学校长的主导下,中国大学在中西文化融合的时代趋势中表现出一些优质的文化特征,如清华大学将传统的“厚德载物”立为校训,鼓励清华学子砥砺德行、培养君子性情;北京大学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为宗旨网罗天下贤才;南开大学强调“天下为公”之传统精神并以此立校育人。总体而言,民国时期中国大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知识分子中“大师”辈出并在中国大学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大学既很好地继承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优秀传统,又在西方文化的启蒙下成功地弱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影响。

1949年以后,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进入“全盘苏化”时期,马克思政治思想文化成为主流,与此相应,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全面反“封”反“资”的浪潮中陷入历史困境。之后的“反右斗争”和“大跃进”将民国以来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几近消灭殆尽。中国大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此一时期,在执政党的主导下,中国大学文化性格表现出了明显的革命性与政治性,“以党治校”(主要表现为政党对大学集中管理与统一规划)和“思想革命”(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原有思想本身及其主要载体即大学知识分子的批判与改造)成为中国大学的共同特征。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中国大学深陷政治与思想的斗争,逐渐沦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附庸。结果是,民国时期所形成的某些优质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特征逐渐“失传”,与此同时却是传统文化中的残渣泛起,一些消极的文化特征日益显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渐进式的上升趋势。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崛起,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一种极大的“理解之同情”,近年面对道德沦落、人文式微、功利主义膨胀,“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等传统教育理念被不断提起而成复兴之势。总体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发展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已然酝酿并逐渐呈现出了一种理想的可能趋势,中国大学不仅在复归传统,而且在复归传统之路上开始自觉取其精华。

综上所述,自晚清以来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有以下共同点。其一,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是一种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相互作用的产物,描述与彰显的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密切连接中国文化与中国大学之“文化传承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其中“文化传承者”作为活着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大学的构建者或主导者,在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二,中国大学文化性格中内含着各种特殊矛盾,即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中国文化中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大学文化性格中尊重西方文化是前提,理解中国文化是根本;辨别消极文化是前提,继承积极文化是根本;承认政府权力是前提,维护学者主体是根本。总结历史经验,保障学者在中国大学的主导地位乃是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与发展中最为根本的要素。“再好的君主制度,再好的君主制度下的高等教育,也是把人民蒙在鼓里,由他摆布,毫无透明度可言。”^[2]再好的政府主导下的中国大学,也不会产生好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如果不存在一种学者主导的中国大学,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不会是“好”的。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的历史教训最为深刻,“闭嘴或者坐牢”浓缩了这一时期中国大学里学者的处境^[7],失去自由的知识分子或主动服膺于权力或被动退而封笔,结果就是,中国大学文化性格裹挟于政治权力,不仅没有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更失去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

二、我们需要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

立足国际视野,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高等教育围绕知识生产,同时向两个向度延伸:一是现代化——时间向度,以应用性转向为表征;二是全球化——空间向度,以分散化、网络化为标志。”^[8]“今天对于大学而言,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9]就中国大学而言,好的是中国大学凭借着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时代契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坏的是中国大学的特殊性,尤其是其文化性格在高等教育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无法凸显甚至愈来愈模糊。伴随着高等教育现代化所带来的应用性转向,高等教育功利化、庸俗化成为其现代化转型的深刻代价,中国大学作为中国的“大学”的特性越来越不明显。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科技化,但唯科学主义最终将高等教育“现代化”异化为“功利化”。池田大作(Ikeda Daisaku)与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指出,“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社会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经成了实利的下贱婢女,成了追求欲望的工具”,“现代教育陷入了功利主义,这是可悲的事情。这种风气带来了两个弊病,一个是学问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失掉了本来应有的主动性,因而也失去了尊严性,另一个是认为唯有实利的知识和技术才有价值,所以做这种学问的人都成了知识和技术的奴隶,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人类尊严的丧失”^[10]。结果是,大学作为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或者政治化为国家单位抑或经济化为企业公司,越来越偏离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本质。“我们的校园,有高大完整的围墙,但根本围不住商业大潮以及世俗口号铺天盖地。”^[11]中国大学还是大学吗?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心里没底。如何既能顺应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潮流又能彰显中国大学作为中国的“大学”的特殊性,成为当前中国大学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当前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成熟的西方大学模式占尽了优势,中国大学作为“中国”的大学的独特性也面临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同质化的挑战。“全球化的危险是趋同性,即媒体内容和全球化制度(包括我们运用的高度教育模式、遵循的国际基准),将迫使每一个人、每个国家进入普遍的高等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将理想化的美国大学模式变成唯一可能的模式。”^[8]这就意味着,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进程中,“大多数国家将注定成为‘一个可能的全球

模式’的失败的模仿者,而不是他们本土民族模式的强有力生产者和全球模式的可能替代者”^[8]。面对如此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大学的特殊性何以彰显?从文化角度看,中国大学文化性格作为中国大学区别于其他非大学机构、区别于其他国家各种模式大学组织的一个本质性特征,是中国大学之为“中国”的“大学”的根本依据。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构建不仅直接影响中国大学在世界舞台上的独特存在与独立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诚如科斯(Ronald H. Couse)所言:“由于创新乏力和缺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中国企业依赖订单化生产——从海外市场接受订单,贴上外国的商标之后销售。对于要重返世界第一的中国经济而言,这种窘况,我们姑且称之为‘没有产品的生产’,实在不敢恭维。”^[12]中国大学无疑也存在类似问题。由于缺乏文化底蕴,中国大学始终处于世界大学的边缘。

基于本土情境,中国亟需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陈平原在解析21世纪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所在时曾指出:“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古老的‘大学之道’。”^[13]纵观中国大学百年史,中国大学没有很好地继承中国古老的“大学之道”是事实。“近代以来,我国大学虽然在形式上沿袭了西方的制度框架,但其精神和理念仍然没有脱离‘学而优则仕’的窠臼。”^{[9]288}晚清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尤其明显,这也是此两个时期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本质所在。今天中国大学的情况虽已略有所变,但仍步履维艰。“在现代中国社会,科举制实际上并未废除,只是换了修学内容、德行品质和学问建制:四书五经及其修身被‘西学’取代,书院被大学取代,一套适应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文教制度建立起来。”^[14]封建君主制下的文教政策在以党治校的现代中国借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延续,在政教一体的框架下二者并无二致。改革开放以来,“学而优则仕”在高校行政级别化的制度框架内又演化出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在行政级别的笼罩下,大学本身也逐渐地‘官场化’,官员‘学者化’,学者‘官员化’。越来越多的官员成为大学的博士或教授,越来越多的大学教授去追逐学校的行政岗位”^{[9]289}。这些问题究其根本皆可在政教不分的教育传统及其所衍生出的以党治校的现代

大学制度中得到解释。如果说晚清时期中国大学沿袭“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是因为“托古改制”以减少废除科举之后的种种不适,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中国大学强力推行“以党治校”对大学生计划培养、统一分配,主要是为了适应特殊时期政治稳定、经济恢复之需要,皆具有历史合理性,那么今天中国大学的很多制度安排就缺乏合理的解释。如有学者所言:现行的高等教育体制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教育部办学”^[15]。在教育部办学的体制下,“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在中国大学之中未衰反兴。如若长期受困于此,中国大学正在萌生与发展的某些积极的文化性格很难落到实处;而如果中国大学文化性格所呈现出的这种“好”的发展趋向被遏制,中国大学何时崛起就会成为未知。

三、如何建构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

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构建不但重要而且必要。那么如何才能最大可能地接近一种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呢?它涵盖了回归古典大学之道、复兴传统人文知识以及以知识分子为核心协调多方关系等多重内涵。

第一,回归古典大学之道。中国古典高等教育哲学与西方高等教育哲学有很大分歧。与西方高等教育哲学强调认识论与政治论不同,中国大学的传统可以概括为教化论或位育论。中国古典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人”或“己”,这是中国古典高等教育的根本价值。中国大学文化性格本质上是以中国古典高等教育哲学为基础。从这一点出发,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本质上应该是围绕这一根本价值而构建起的一系列“好”的中国大学品质。从文化视角审视,什么才是“好”的中国大学品质?古之“大学之道”——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作为中国古典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与最高理想无疑描绘了中国古代大学最核心的品质。关于“大学之道”是否适用现代大学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两千多年前的大学主要是育人,而今日的大学不仅要育人还要治学,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大学之道’才能对今日的大学本质及其办学规律做出科学的回答。初步看来,这个新的‘大学之道’可以表述为‘大学之道,在明德崇学,在亲民新民,在多元卓越,在止于至善’,这里既有继承更有创新”^[16]。

另一种观点主张“中国的大学与西方的大学基本接轨了,但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文逐渐被边缘化”,即从“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到“在明明理,即科学的‘理’‘新知’;在止于‘至真’,即真理”的转变,“现在的大学变成了只寻求知识和真理的大学,而不是追求美、善的境界和做人的道理的大学;虽然卓越,但失却了灵魂。中国古代的‘大学’之道不能放弃”^[17]。两种观点对于古代中国大学之道的肯定态度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创新”,而后者更加注重“固本”。就中国大学的现状来看,“固本”比“创新”更为重要。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不是鼓励人们常说的创新和独立思考,而应当体现“民族生活中保守与团结的因素”^[18]⁹⁴。中国大学亟需的并非对传统的创新,能够领悟并继承传统的真正内涵才是首要的。“大学之道”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不仅只是一种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理念,更是一种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这就意味着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不仅在于办好一种高等教育机构,还在于为了启蒙与形塑“好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理想建构只有回归“大学之道”,才能体现中国古典高等教育中人的核心地位,才能找到本身所是。

第二,复兴中国人文传统。从知识的类型上看,古典人文知识无疑是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一个显著标识。韦伯(Max Weber)曾界定中国传统社会的“士”,称之为“受过人文教育的‘士’”或“接受人文教育和考试的‘士’”^[19]。中国古典高等教育以人文知识为主要内容,将研读儒家经典作为最基本的教育方法,根本目的在于培养文治政府所需要的士。近代以来伴随着传统政治秩序的瓦解,中国高等教育从经学转向科学,进入了高等教育的“科学”阶段,然“人文”传统始终存在。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说:“从北大的传统影响和未来发展来说,文史哲是最应受保护和重视的,因为文史哲所代表的人文学科,不但是民族文化遗产创造的命脉所在,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价值引导的源泉。”^[20]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构建,需要以优秀的中国古典人文知识为根基,通过复兴中国人文传统以重塑中国大学的人文性格。中国大学何以复兴中国人文传统?承载古代知识与思想之古籍经典无疑是其唯一现实凭籍。“优秀的古典

文学作品总是诉诸我们更高的理性与想象,形成最为纯粹的古典精神服务于更高的理性,它把我们引向类似宗教的目的,与‘深藏我们自身之中的、与天地通体惟一真实的自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18]94}这是科学作品不能达到的境界。近代以来伴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西方科学价值观念的渗入,古籍经典作为无用之学在中国大学备受冷落,中国大学的传统精神随之衰微。回归古代经典,复兴人文传统作为中国大学建构理想的文化性格的重要途径在当前更具迫切性。

第三,以知识分子为核心,协调大学、学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历史证明,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形成需立足知识分子的内心,扎根中国大学的自由土壤,兼以充分发挥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调控作用;而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协调三者之间尤其是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面对中国文化在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大学中的复兴,政府应该如何处理与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始终一个关键性问题。根本上讲,充分尊重与信赖知识分子是构建理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国文化之养成自有千年的传统,衰落只是近百年的事情,很大因素在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失承。新中国成立头十七年,共产党与国民党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却没有能够继承民国知识分子,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改造使中国文化几近断裂。今天传统知识分子已逝,然而具有传统文化性格的知识分子并未完全失承。以史为鉴,中国大学的文化性格凡能学者自主则盛,反之则衰。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理想构建,根本在于确立知识分子的核心地位。如果说“好”的文化品质与人文性格是理想的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内在灵魂,那么大学、学者与政府之间的独立与协作则是中国大学坚守灵魂的外部工具。自由的学者主导中国大学,目的就会支配手段,理想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形成成为可能,大学的中国模式可待;若政府凌驾于学者之上操纵中国大学,大学的文化性格难免陷入泛政治化的窠臼,距离真正的中国大学愈远。归于一点,中国大学文化性格的理想建构实赖于一个开明的政府。

参考文献

- [1] 刘海峰. 传统文化与中国大学的特色[J]. 青岛化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10-14.

- [2] 涂又光. 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 [3] 石中英. 教育学的文化性格[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187.
- [4] 余英时. 现代儒学的回望与展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总序 9.
- [5] 刘梦溪. 传统的误读[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03.
- [6] 曹锡仁. 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关于中国文化选择的再检讨[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435.
- [7] 吴 勇. 大学文化:理想与现实的冲突[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15.
- [8] 蔡宗模,毛亚庆. 高等教育全球化:逻辑与内涵[J]. 高等教育研究,2013,34(7):10-17.
- [9] 王建华. 我们时代的大学转型[M]. 北京:教育出版社,2012.
- [10] 池田大作,汤因比.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 荀春生,朱继征,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61.
- [11] 陈平原. 大学有精神[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0.
- [12] 科 斯,王 宁.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 徐 尧,李哲民,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49.
- [13] 陈平原. 中国大学十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8.
- [14] 刘小枫. 拣尽寒枝[C].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5.
- [15] 朱永新,马国川. 重启教育改革中国教育改革十八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39.
- [16] 王冀生. 论大学之道[J]. 复旦教育论坛,2005(1):20-24.
- [17] 金耀基. 重思大学之道[J]. 探索与争鸣,2013(9):82-85.
- [18] 侯定凯. 中国大学的理性之路[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9] 张仲礼. 中国士绅——关于其在 19 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M]. 李荣昌,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3.
- [20] 李宪瑜. 北大缤纷一百年:北京大学建校 100 年庆典纪盛[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49.

(责任编辑 马双双)

(英文摘要下转第 32 页)

Survey and Proposal of Curriculum Provision for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xcellent Teacher Training

ZHONG Yongwei¹, CHENG Sihui¹, CAI Zhaohui²

(1.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mathematic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normal) and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English(normal) as examples, discusses their curriculum structure and main problems existing, and reveals improving path of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by conducting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on hundre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by making content analysis on universities' related curriculum provision texts. The result shows that our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in general has not yet built up a modern curriculum system that meets the need of the excellent teacher training. Compared with normal colleges,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have not shown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 as expected. On the contrary, their curriculum systems conceal the functions of teacher education even further. It is necessary for relevant personnel to sets up the excellent educational philosophy, uphold not only the ideas of "teacher-training and academic promotion simultaneously and giving the former moderate priority" but also "Harmonious Integration", seek the appropriate way to take the academic rationalism orientation, cognitive process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self-realization orientation into account in curriculum design, and strengthen students' abilities in teaching practice.

Key word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 curriculum provision; excellent teacher

(上接第 11 页)

Chinese University's Cultural Character: Historical Reflection and Ideal Construction

WANG Jianhua, JIA Jia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university's cultural character which is based on the Chinese culture is the fundamental feature to make Chinese universities keep essential.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is not only a social institution which integrates the functions of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 which are transplanted from the western university model, but a cultural entity which is based on Chinese culture and different from any other national university institutions.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 has been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manifested time rationality and historic limitations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view of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t is not only necessary but also quite possible to rebuild the cultural character of Chinese university today. Chinese university should return to the university ideology, revive the long cultural tradition and establish the core position of intellectuals to buil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model". This is the way to foster the ideal model of cultural character for Chinese universit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nese university;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character